



唐代文学研究

(第九辑)



主编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广师范大学中文系
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第九辑)

Tangdai Wenxue Yanjiu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会

主编 傅璇琮

副主编 阎 琦 张明非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芳民 张明非 肖星明

党玉敏 阎 琦 傅璇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学研究·第9辑 / 傅璇琮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

ISBN 7-5633-3493-9

I. 唐… II. 傅…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集 IV. I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75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 890 mm×1 240 mm 1/32

印张: 26.75 插页: 2 字数: 794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 定价: 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辑前记

本辑《唐代文学研究》是2000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选辑。这次会议由学会与武汉大学、湖北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郧阳师专协办，在武汉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近120人（其中日本、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学者20余人），收到论文100余篇，经过编者编选，共有79篇论文收入本辑之中，另有数篇论文交由学会另一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刊载。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的会议。代表人数与收到的论文数量均较以往几届年会多。在这次会议上，海内外的学者以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的形式，不仅对海内外各地区及唐代文学各分会的研究活动情况进行了报告与交流，而且与会代表还就各自的论文论题作了宣讲与讨论。会下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一些学者在会后还吸收交流讨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充实。这次会议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气氛。从提交的论文来看，论题也十分广泛，涉及唐代诗歌、散文、词、音乐以及历代唐诗学等内容。研究的视角，既有对新的文献材料的发掘利用，也有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多元思维对相关论题进行宏观综合探讨，还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考辨与诠释。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在论题的新颖、论证的扎实深入上都值得称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由于本次会议论文数量较多，整体水平也较高，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这次会议的盛况，展现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本辑选入了较以往更多的篇目。这样一来，论文集的字数就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给印刷、装订带来困难，并将加重相关单位的经济负担。为此，编委会在编辑过程中曾致函论文作者对论文作了适当的删节压缩。因此，收入本辑的论文，多是出席会议代表论文的删节压缩稿。其中部分论文，可能由于作者外出等原因，未及寄回压缩删节稿，因为出版周期所限，编辑部只好组织力量，在不影响论文主要论点的情况下，代为作了压缩删削，其间或有未尽妥当处，敬祈相关论文作者予以谅解。

对于未选入本辑的论文，这里略作说明。这些论文，大体包括下面几

种情况。一是未赴会代表的论文；二是提交多篇论文者，本辑只收其中之一；三是论文作者建议不再收入者；四是回顾、总结、综述及书评类。第四类部分论文转交学会另一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刊载。为使论文集更具文献价值，上述论文仍列入目录，作存目处理。未收入的论文，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但因篇幅所限，仍难免遗珠，经编委会研究，只能这样处理了，对此，也请有关作者及读者谅解。

本辑论文集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等诸家作为年会的承办单位，从会议经费中将对论文集的出版予以适当资助，在此，我们对上述单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会

2001年3月

目 录

TANGDAI WENXUE YANJIU MULU

唐诗研究百年的走向和得失(存目).....	葛晓音
唐五代词研究的百年回顾(存目).....	刘尊明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存目)	董乃斌
唐诗之现代意义	(韩国) 金世焕(1)
佛宫南院独游频	
——唐代诗人游居寺院习尚探赜	李芳民(9)
唐代散文“道”“艺”论	阮忠(22)
唐代笔记小说的材料来源	周勋初(32)
唐代音乐文献研究叙说	(日本) 斋藤茂(44)
唐代“常明经”试策考述	陈飞(53)
《古今词统》误收误题唐五代词考辨	王兆鹏(74)
《全唐五代词》编撰摭谈(存目).....	王兆鹏
论花间词的语言特色	房开江(85)
唐诗中的“长城”.....	朱明伦(95)

唐人昭君诗的历史内涵	吴河清(101)
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	谢思炜(107)
论初唐人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与诗歌入乐之关系(存目)	吴相洲
初唐诗人与其“八病说”运用	(日本) 加藤聪(121)
近二十年宋之问研究综述(存目)	周斌 尚永亮
吴富体考论	胡可先(129)
开元文风走向论	熊礼江(141)
当朝师表 一代词宗	
——试论张说在盛唐前期文坛的领袖地位及成因	丁 放(152)
古雅:张九龄的人格与诗格	马茂军(162)
论孟浩然山水诗“诗中有画”	余传棚(172)
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辨	韩 樱(178)
初唐诗对王维诗的影响初探	(日本) 入谷仙介(182)
情景交融与王维对诗歌艺术的贡献	陈铁民(188)
从王维诗风的转变,论佛教对诗歌创作的消极影响	张海沙(200)
王维“安禅制毒龙”考辨兼其佛教诗的实践性(存目)	
.....	(日本)内田诚一 刘维治(译)
李颀诗中人物形象简论	王友胜(213)
李杜之变,是唐诗主潮之大变	葛景春(225)
大孤独与大寂寞	
——李白孤独心态及排遣方式探析	郭顺玉(238)
李白诗歌中色彩字运用之艺术	(台湾) 杨国娟(247)
也说唐诗人李白与南朝诗人谢朓之关系(存目)	熊 飞
生命的激扬与民族的活力	
——论李白的历史意义	戴建业(260)
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	郁贤皓(272)
李白张谓交游考	熊 飞(279)
从几种新证据看李白《菩萨蛮》词的真实性	罗 漫(285)
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存目)	殷满堂
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	(台湾) 简锦松(297)

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

- 兼论唐代的墨制(存目) 邓小军
- 二十世纪杜甫研究述略(存目) 张忠纲 赵睿才
- 略论郑虔与台州唐代文化 郑瑛中(314)
- 元结作品反映的政治认知 (台湾) 杨承祖(322)
- 寒山生卒年新考 罗时进(333)
- 略论中唐始期的诗歌走向(论纲) 马承五(346)
- 中唐诗学造境说与佛道思想 (香港) 刘卫林(352)
- 从对屈、贾、陶的接受态度看中唐贬谪诗人的心态 尚永亮(370)
- 论唐代文人恋情诗 黄世中(383)
- 刘长卿集版本考述 陈顺智(396)
- 论韦应物的人格转换及其典型诗风 孙映逵(407)
- 韦应物《山耕叟》文化语境试探 沈文凡(414)
- 唐代古文运动之中的居士作家
- 以李华、梁肃为中心 (日本) 须藤健太郎(419)
- 论孟郊反屈骚倾向及其创作失误 孟修祥(428)
- 梁肃的文学观 胡大浚(434)
- 论韩孟诗派的形成与发展 毕宝魁(443)
- 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 陈允锋(450)
- 韩诗异文论及其体现 (韩国) 李揆一(459)
-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阎琦(470)
- 韩愈《吊武侍御所画佛文》的几个问题(存目) (台湾) 柯万成
- 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戴伟华(482)
- 《昌黎文录》钩沉 刘真伦(493)
- 儒之大者
- 韩愈儒学的历代评价 周敏(503)
- 白居易的音乐、舞蹈、绘画思想 刘维治(514)
- 文体选择与文体自觉
-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之再认识 刘明华(522)
- 白居易闲适诗与基督教圣诗简论 张思齐(530)

试析《杜子春》和《杜子春三入长安》的叙述

- 话语及意义建构(存目) (台湾) 康韵梅
 王建生平考论 张耕(541)
 王建仕履补考 曾广开 吴险峰(559)
 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 (台湾) 朱国能(567)
 由种树看柳宗元对生命的关怀(存目) (台湾) 方介
 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文学创作 谢汉强(582)
 从柳宗元诗歌看中唐长篇五言排律的创作 鲁永良(590)
 刘禹锡对乐府古题的体认与运用 (韩国) 金银雅(595)
 刘禹锡诗中的九仙公主考 陶敏(607)
 李贺诗风与唐人小说中的鬼诗 余来明 陈文新(613)
 沈亚之行年考 张清华(620)
 晚唐唯美诗风格特色之探索 (韩国) 朴柱邦(633)
 晚唐“三十六体”辨说 李中华(645)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的文献价值
 ——从一条稀见的杨贵妃资料谈起 吴在庆(652)
 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
 ——中国古代象征性多义性诗歌之从主理到主情 余恕诚(660)
 以兴为诗
 ——李商隐诗对传统比兴艺术的开拓和深化 张明非 李翰(672)
 锦瑟·日暖·春天之诗(存目) 罗漫
 李商隐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行踪考述
 ——对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的续辨正 刘学锴(683)
 读《李商隐诗歌集解》说疑 郑在瀛(691)
 日本 20 世纪李商隐研究简介(存目) (日本) 森冈缘
 许浑与李珏
 ——许浑“寄李相公”两首诗对“牛李党争”研究的启示
 (日本) 户崎哲彦(702)
 论唐末的香艳诗人 刘宁(719)
 《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 (香港) 贾晋华(729)
 论晚唐的咏史组诗 莫砺锋(744)

- 宋代唐诗批评中“性情”说的演绎 朱易安(760)
论“诗史”说
——“诗史”说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纂之关系
..... (日本) 浅见洋二(773)
吴乔之李白杜甫优劣论 (香港) 郑滋斌(789)
金诗学唐的历程 王锡九(811)
《唐贤三昧集》与王渔洋诗学 蒋 寅(822)
《祖堂集》及其释佚 陈耀东 周静敏(836)

唐诗之现代意义

(韩国) 金世焕

一、序 言

韩国的三国时代，新罗有位女王溢曰善德。一然的《三国遗事》有她“知机三事”的故事：

初，唐太宗送花牡丹，三色红紫白，以其实三升。王见画花曰：“此花定无香。”仍命种于庭。待其开落，果如其言。

其后臣下问她：“何以知花之然乎？”她回答说：“画花而无蝶，知其无香。斯乃唐帝欺寡人之无耦也。”善德女王是终身没有结婚的。唐太宗是否真的有意戏弄她，是很难说的。不过这足以说明我们语言的含义是何等丰富，譬喻的功能是如何微妙。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唐诗的这种譬喻功能。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只占了三百年，不过在语言发展史上，唐诗所应有的地位是不能以年资算的。唐诗何以有如此成就，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难用三言两语说清的问题。

说到唐诗，应该先从中国诗歌的历史谈起，再探讨其意义如何，这样比较能接近其本来面目。不过我是韩国人，又对中国的学问谈不上研究，只是凭爱好中国文化的热情，说一点很肤浅的意见。在这里我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唐诗，即：第一，从它与“诗言志”传统的关系来看；第二，从它与“歌永言”传统的关系来看。这里我有一个小意图，就是想探寻一下研究唐诗的现代意义。我们是继承历史而能展望未来的。我们的衣、食、住都是继承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才有现在的特点的。对唐诗也应如此，我们现代人读唐诗应该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太注重现代，几乎都坚持今是古非的态度。研究古文化看来不很切合实际需要，好像考古一样，只要找些史实证据，终觉得有些呆板，其实不是这样。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当然很重视《诗经》。孔子认为“诵诗三百”，不但使人涵养德性，抒发情志，博物多识，而且事君事父，甚至在政治外交方面也有功用价值。我们知道，这时候的诗歌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作品，大多是至少从几百年前就开始流传，如果我们肯定孔子删诗之说，那么，孔子不但是研究诗歌的开山之祖，而且到目前为止，他的研究成果及贡献也算是最大的了。

无论如何，孔子以后一直到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前，大约两千几百年，如果我们不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十三经诸书，特别是六经，可说是国文化的枢纽。其中诗歌的传统，加上后来的楚辞及汉诗，如孔子所言的

功用价值，似乎一直没有丧失过，反而更加突出，不仅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而且成了男女老少都喜爱的诗歌。

我们现在研究唐诗，其方法及目的早已与古不同，恐怕有些地方还需要检讨。

由上引的文字看，孔子对诗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当然删诗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

李浩先生在他的《唐诗美学》里大发感叹，说：“唐诗，在现代人心目中难道不正像‘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吗？由于时代、社会以及语言符号所积淀的文化——心理内涵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我们主观上想直截了当地步入诗境，领略她的风采，占有她的感情，但实际上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只能‘溯游从之’，移形换步，上下求索，从不同的方位和视觉，来想像她的冰清玉骨、花容月貌，捕捉她骚动的灵魂。”

唐诗对于现代人来说，真是“浮沉各异势”无法会合的吗？唐朝与现代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距离，当然有了“极大的变异”，领略唐诗的风采、感情，有些困难是一定的。但说时代变了，就难以捉摸唐诗的真面貌，却不一定。因为所谓变化并不能说是诗歌本质上的变化，只有语言习惯及有些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已。“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自古没有两全其美，现在还不是一样？“高堂明镜悲白发”，现代人也是最怕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现在在这里的我们就是这样，如此的相逢就是如此的高兴，正是古今没有不同。这些诗歌的主题本质，是《诗经》以来都不曾变化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不能说是很重要。只有我们语言习惯的变化比较大，而且应该要检讨一下。

现代人对唐诗及古文的态度是很有成见的。大家都注重白话文，而对古文常有排斥感。方东美曾经指出，文字是记载历史文化的主要工具，我们从稍后的朝代瞻望认识或继承前面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假借于文字是很容易的。远至黄帝，唐虞、夏、商、周，近至宋、元、明、清，皆如此传衍赓续，一直没发生过大问题。但是到了近代五十年，由于过分标榜白话文，奉白话文为惟一的文字工具，久而久之，对于中国古代的语文习性就忽略了，对古籍的不易了解、对固有文化的认识不深刻而趋于冷淡是极其自然的。

所谓“极大的变异”原来就是这种“冷淡”的心理变化，所以我们总是觉得格格不入。我想唐诗并不是现代人很难懂得的东西，更不是可以丢在博物馆不顾的老古董。因为我们受到西方的影响太大，所以常用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就说“古怪”的地方太多。一味要用表音文字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这才叫做古怪哩。

二、唐诗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今文《尚书·尧典》里的这几句话很可能是最早阐释诗歌特征的论断。朱自清曾经在他的论文《诗言志辨》里作了详细的研究。他说：“只谈诗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他把“诗言志”分成四个条例来论述，即：1. 献诗陈志；2. 赋诗言志；3. 教诗明志；4. 作诗言志。他引郑玄注谓“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提出诗之两大传统观念：一是诗言志，二是诗乐不分家。从此，他认为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传统。

何以形成这样的传统？朱自清对于志与诗之关系作了考证。《说文解字》把“诗”解释为“志”，从“言”，“寺”声。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孔颖达《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

情、志一也。”朱自清认为汉时人又以意为志，因此就说情和意都是指怀抱而言的。

这样的怀抱并不是一时的感情，更不是就一时感情的寄托而言。《诗经》作者用意明显而又很具体，如《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作诗、采诗、删诗都有用意。所以，可以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可以说，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这就是《诗经》以来形成的诗歌言志的传统观念。

这种传统到了唐代，有了更加广泛具体的运用，不少诗人的诗能做到语言妙尽其意。王维《息夫人》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唐孟繁《本事诗》记载：“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爱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云云（息夫人）。——王乃归饼师，使终其志。”《息夫人》就是赋诗言志，短短的四句诗，使宁王恢复做人的本来面目。王维还作《西施咏》来讽刺“效颦”行为，其后经过一千多年之久，这首诗还是动人不已。因为我们效西国之颦，可能远超过东施效西施之颦的盲目心理。真怪，古今东西不会变！

李白言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不是一时的情绪，更不是为了浪漫而写的。这是由他个人遭遇所累积起来的、无法可诉的真实情怀，送友之际，就以适当的表现形式表达出来了。他能找到这种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并不是刻意表现其浪漫精神，而主要靠的是他平素的学问和人生阅历。

如何能有像李白那样的诗人？当然应该有很多因素，不过先要举出像李白“磨杵成针”的苦读，加上他所遭遇的艰难，或许就能使他“究其工，竟其才”了吧。

白居易就不喜欢所谓“嘲风雪，弄花草”，他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可以说是继承了“诗言志”的精神，特别是继承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他

又说：“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序》）

唐朝的四万余首诗，当然不能全以这种观点来归纳。不过诗的本质上的传统，我想都是一以贯之的。

三、唐诗继承了“歌永言”的传统

前面已经论述过，“诗乐不分家”是《诗经》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把自己的怀抱用诗歌来表达，形成诗言志的传统，这应该说是中国文章的特点。诗与乐不分家，就有了“诗歌”一词。这是由中国文字的特色形成的。因为孤立的文字最适合于作韵文，很容易配合音乐。再说，中文字尽单音，词句易于整齐划一。“依访欢，欢访依”、“桃红柳绿”，稍作变通，即成排偶。西文单音字与复音字相错杂，意象尽管对称而词句却参差不齐，不易对称。在西方，小说与戏剧比较发达，与其语言特色关系密切。还有西文的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自由伸缩颠倒使两句对得很工整。比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里没有一个虚字，每个字都实指一个景象，若译为西文，就不知要加多少虚字了。“青山绿水”、“才子佳人”这些骈偶词组，表音文字无法作出。中国把诗与歌合成叫诗歌，表示诗就是为了歌唱而作的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到了唐朝，一方面由于律诗的发展，作诗句式更加工整；另一方面吸收西域的音乐，唐朝的诗歌艺术因而极为发达。

朱谦之在他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中提到唐诗大抵都是可歌唱的。他引王世贞《万首绝句选叙》说：“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景’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大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又难指数。有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朱先生归纳几家的说法证明“近体大约可用歌唱”。又唐宣宗哀悼白居易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歌行体也是能够吟唱的。这就表示有唐一代唱诗的风气十分

流行。不过唐代的诗虽都可歌唱，但是关于这种歌唱的记载，流传到现在的却不多。

在此可以看看辛文房《唐才子传》有关记载：“之涣……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共诣旗亭，有梨园名部继至，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适一绝句。之涣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涣词。三子大笑，曰：‘田舍奴，吾岂妄哉！’诸伶竟不喻其故，拜曰：‘肉眼不识神仙。’三子从之，酣醉终日。”

我们可以想像，傍晚，一群男女边唱边舞，气氛十分优雅，众人欣然之际，却不知道他们旁边的三个人就是他们所唱歌词的作者。唱了好多首才知道他们的存在，风流才子与梨园子弟共享同乐，唱你的诗，听我的歌，是如何美好的夜晚，唐诗之美就表现在这里了。唐诗如此的生动活泼，是因为继承长久的历史而融合打成一片的文化的关系了。

四、余 论

当今许多人中，存在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以为西方的月亮才亮，二是以为今是而古非。何其芳曾说过中国的文学比欧洲的文学落后，因此中国要尽快学习欧洲的文学。现在大概不会有这么想的中国人了。我虽然没看过他晚年的说法，不过我想他后来是会改变这种观点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并不能以一个相对的标准来评论，他本身有绝对价值。实际上中国文学并不比欧洲文学落后，不过我们有些人心中还是有“效颦”的情结，习惯于用衡量西方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唐诗。因此，研究、品评者多，很少有认真学习、继承其精神和艺术传统而将其应用到今天文化思想建设和文学创作中的，甚至凭所涉猎的一点西方的知识来骄傲，轻视我们自己的传统。

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里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又说：“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